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陈原创世的人们

第三十九辑

甘肃人民出版社

2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陇原创世的人们

葛士英
一九九四年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四年·兰州

(甘)新登字第01号

E63/09

政协文史资料39辑

《陇原创业的人们》

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40,000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26-01349-5/K·221 定价: 8.00元

目 录

为了这一方热土

- 忆我和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及甘肃农业大学……………朱宣人 (1)
- 陇原上度过了我最好的年华……………廖延雄 (17)
- 建城造房五十载……………任震英口述 柴玉英整理 (32)
- 平凡的旅程

- 回忆我在西北师大的工作……………白光弼 (54)
- 风雪高原二十年……………魏建功 (67)
- 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

- 回忆我的采矿生涯……………周世昌 (79)
- 护理专家张开秀事迹……………宗元 (87)
- 千辛万苦育良种……………董祥华 (91)
-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甘肃的戏剧艺术……………陈光 (96)
- 裴慎先生生平事略……………邓品珊 (110)
- 为西北军民的病理学研究贡献余生……………张继增 (122)
- 救死扶伤四十一年……………黄文庆 (128)
- 兰州二中实验工作回忆……………岳怀万 (137)
- 甘肃水土保持工作的几位开创者……………祥华 (150)
- 回忆我的铁路生涯……………王作霖 (170)
- 为大西北的煤矿建设拼搏……………罗玉淳 (183)
- 教学、科研五十载……………雄鸣峻 (190)
- 情系秦声 不懈追求……………颜玉梅 (197)

从事水利工作五十年的回忆·····	刘 荣(206)
把青春奉献给祖国	
——回忆沙坡头铁路治沙经过·····	张宝善(213)
艺海采珠	
——追忆几位秦腔名演员·····	王界禄(225)
我是怎样走上二尺讲台的	
——一个普通农民女儿的自述·····	柴玉英(237)
忆我国第一个铁路治沙工程·····	赵性存(249)
艰难的攀登·····	崔宝山(257)
我的路·····	常校珍(265)
初到甘肃的一段回忆·····	韩福祥(277)
乐将毕生献苗圃·····	徐士贤(282)
从事教育、科研、史志工作的经历·····	李 光(286)
为了明天	
——回忆我从事的铁路建设工作·····	陈守常(298)
一个勇于探索的人	
——记会宁一中教师韩独石·····	康正芳(310)
后记·····	韩淑休(315)

为了这一方热土

——忆我和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及甘肃农业大学

朱宣人

步入人生

我1916年出生于现在的江苏省宜兴市。父亲是一位小学教师，母亲粗通文字，终生操持家务。我在一个小康的生活环境中顺利成长，在家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又到苏州读完高中。在读高中独立生活的3年中，除上课学习外，还和同学们一道参加了当时蓬勃的抗日救亡活动，诸如向当时的南京政府请愿等。

193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正值家境日渐衰落，生活困难。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我报考了不收学费的北平师范大学，主修生物学，副修化学。当时日寇在侵占东北后已觊觎东筹建伪政权。为此，我在北平师范大学只读了一年便再次报考了南京中央大学，读农业化学系。这时的中大虽有许多系，其中畜牧兽医系正处于大力充实发展阶段。一日，中大农学院院长邹树文亲自出面找我谈话，动员我转入该院的畜牧兽医系读书。

这件事使我陷入了艰难的抉择。因为在当时，要立志学兽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当时的社会风气贱视兽医工作者，连急需兽医的农牧业区亦如是，有兽医“生不能进祠堂，死不能进祖坟”的陈规陋习。加上国家也

不重视兽医教育，全国除国民党陆军系统有一所较完整的兽医学校外，另有8所高等学府设有畜牧兽医系，这在一个全国有90%以上的人是农民的国度里，要发展畜牧业谈何容易！

最终，毕竟是科学战胜了愚昧。在当时还模模糊糊的科技救国的信念支持下，我拿出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劲头和勇气，昂然踏入了畜牧兽医系教室的门。

1937年中大畜牧兽医系西迁成都，我在这里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论文是《成都猫的内寄生虫》，取得了农学学士学位，和同班的一位同学一块留校任教，当了罗清生教授的助教。在教学实践之余，我主要参加《畜牧兽医月刊》的创办工作，负责组稿，写稿，校印以至发行等一系列工作。在罗清生教授指导下，我与他合译了英国CTOSS, H.E.编著的《骆驼及其疾病》一书，这是我踏上兽医教学工作岗位后的第一部译著；此外，还在月刊上发表了《影响四川养猪业的诸因子》和《四川牛痘之分布》等调查报告。

不久，在罗清生教授推荐下，国立西昌技艺专科学校聘请我作他们畜牧科的兽医学讲师，主讲兽医内科学和传染病学。1941年春季，冕宁县发生牛瘟，我带领学生赶到现场进行防治。以后，又参加了盐边，盐源两县的农林牧资源调查。这一时期的工作特别忙碌，但我还是挤时间独自翻译了一本英文兽医内科学和一本英文兽医手册，使我的教学、实践和英文水平都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刻苦深造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中英庚款董事会恢复了第八届留英公费生的招考工作，畜牧、兽医两个专业各招两名留学生。我想，既然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学了这

专业，就应该不懈地努力，使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博大精深起来，这样才能使自己有能力为社会服务，更重要的是使后来者有师可承。基于这种想法，我放胆迎着出国考试竞争激烈的风浪而上，这年春天赴成都参加了留英公费生考试。同年冬，在我考完重返技专后不久，就接到了录取通知书。翌年，战争的硝烟还没完全熄灭，我就按通知要求到重庆集中，参加了出国前的“留学生讲习会”，随即赴英。途经成都，去拜望母校老师，罗清生教授建议我出国后主修病理学，因为这门课当时人才奇缺，除陆军兽医学校曾由一位外籍教授主讲外，地方高等兽医教育都没有开设此课。到渝后，便向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我学习的科目，由他们转告英国的“大学中国委员会”进行安排。抵英后，我被安排进入爱丁堡（狄克）皇家兽医学院研究生院进修病理学、微生物学、内科学、诊断学和有关的实验室技术，并到玛邓研究所专门学习牛乳腺炎微生物学实验室技术。

当时，英国的研究空气和条件远比我国好得多，我暗下决心要抓住机会多学点东西。每天除吃饭、睡觉外，几乎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这一时期，我还担任了英国《兽医公报》的特约撰稿人，将我国的畜牧和兽医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和最新动态用英文翻译后，摘要向世界各国介绍。

1946年暑假后，我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教授和兽医学院病理系主任教授共同指导下，参加了全英抗牛乳腺炎会战，题目是关于乳室的组织病变与所含细菌同该室乳汁里的细菌以及其他异体成份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据此对当时通用的临诊病理学方法进行评价。翌年秋，完成了论文，爱丁堡大学授予我哲学博士学位。紧接着，我先后到该校医学院病理系进修和东苏格兰兽医诊断实验室学习有关病毒的实验室技术。没想到离英前分秒必争地抢学到的这些知识和技术，回国后都用上了。

归国途中

1948年10月，我完成了初步研修任务，面临的问题是今后的人生之路怎么走，要再作一次选择。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国外工作，有优厚的报酬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另一条是回到那个多灾多难、贫穷衰弱的祖国的怀抱里。当时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一条艰难的攀登之路。

回国的路线，是从英格兰的南汉普顿到香港，再到上海。船过新加坡后，在船仓里读到了归国同学暗中传阅的两本书——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船到香港后，又被比我先一年离英赴港的同学曹日昌，派人将我和一部分同学接到达德学院，听了一场关于国内形势的报告。我们离开祖国4年了，在国外整天埋头书堆，对国内形势一知半解；听了翦伯赞等人的关于国内形势的介绍和分析，竟如提壶灌顶，顿开茅塞。原来国内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将要彻底垮台了。

当时我想，一个崭新的中国将要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她是一个饱经忧患后昂然挺立的慈爱的母亲，她将会用温暖的手频频召唤苦难中离散的孩子……此时不归，更待何时？

9月初，我离港到了上海，同专程从天津赶来的妻子刘沂年相会。由于我是学畜牧兽医的，在选择国内的工作地点时，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当时国立兰州兽医学院院长盛彤笙同心协力建设大西北的邀约，日夜兼程飞到了祖国的高原腹地兰州城，担任建院刚满两年的国立兽医学院病理学教授、兼任病理科主任和学校的教务主任；妻子刘沂年任兰州大学理学院数学系副教授。

黎明之前

工作没多久，兰州即将解放。国民党教育部要求各高校成立“应变委员会”，并任命盛彤笙院长为“主任”，我和总务主任常英瑜为“副主任”。我们听说马步芳有裹胁高校师生及图书仪器逃往新疆或青海去负隅顽抗的打算，就立即开展护校工作，把一部分图书仪器藏进学院的伏羲堂天花板内，另一部分装箱，佯作“逃跑”模样。继而又传闻，马步芳要炸毁伏羲堂作背城一战。为使这批图书仪器能安全地回到人民手中，我们几个“主任”又商量出一个对策，将仪器从天花板上取下来，连同图书全部装箱，送往萃英门内的兰州大学隐藏起来。常英瑜领导一支由青壮年师生组成的护校队看守学校，我组织其余师生员工及家属迁往兰大，进入兰大的防空洞内避乱。

轰隆隆的炮声响了几天，终于，盼到了8月26日兰州解放了。在10月1日这一天，全院师生集会欢庆新中国的诞生，并举办了为期3天的展览会，宣传兽医科技和家畜疾病的防治知识；同时纪念学院成立三周年。当时兰州的党政军领导到校祝贺，并勉励我院师生继续保持党的光荣传统，为大西北培养出合格的兽医人才而加倍努力。这番语重心长的勉励，使全院师生受到了极大震动，大家都激动万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健康发展

1950年4月，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畜牧、兽医、牧草3个科的教师9人，学生23人并入国立兽医学院，随之成立了畜牧系。这时，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畜牧部，任命盛彤笙为该部副部长，同时兼任兽医学院院长。同年12月，奉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

部令，并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学院改名为“西北兽医学院”。翌年，政务院正式任命盛彤笙为院长，我为副院长。

1952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原西北农学院牧医两系的师生89人与我院的两系合并。至此，学院拥有学有专长的教授、讲师20余人。第二年，学院奉命改名为“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从1954年起，两系分别增设两年制的畜牧和兽医专修科，先后共招生3期。畜牧系下设牧草、饲养、畜产、生物、选育5个科，盛院长亲任系主任（随后又由留英归国的杨诗兴教授接替）。兽医系下设解剖、生理药理、生物生化、细菌、病理、寄生虫及诊疗7个科，由留美回来的蒋茨升教授任系主任。学院附设有家畜病院和畜牧场各1个，牧场占地由原先的37亩扩充到175亩。

由于教师力量强，主要学科都有了带头人，所以解放后不久，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学校很快步入正规。各科教授首先抓教材和实验室建设，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1952年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洪流中，曾按照苏联模式制订过教学大纲，并据此作出各科的教学计划，然后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组织翻译苏联教材；结合我国，特别是西北地区的特点，共编写出45门新教材。1953年起，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两年后，开始派教师和学生去当时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

这一时期的科研工作也十分活跃。从1950年到1954年的5年中，每年开展多项结合教学和生产服务的研究，全校有10%的教师参加。随着西北地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学院先后与省内外一些生产和研究单位合作，进行了基础性的调查与实验研究工作。1955年建立了天祝高山草原试验站，开始高山草原定位观察。

从建国初到1958年，学院在调查研究方面获得的成果显著。其中具有指导意义和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骆驼蝇疫、西北高山草原、宁夏中卫羔皮山羊、西北饲料营养成份、岔口驿马和

绵羊抗蠕虫药及其使用方法、家畜血吸虫病的流行病学及诊断、羔羊痢疾、马类动物肿瘤、绵羊肺腺瘤等的调查研究，在国内都属于开创性研究，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当时学院十分重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在兰州解放不久的1949年12月，就开始举办畜牧兽医训练班。到1951年3月，共培训畜牧兽医人员264名，成为甘、宁、青三省区防治牛瘟、口蹄疫等疾病的主力军。他们中不少人通过进修和工作，成为西北地区畜牧兽医事业的骨干。1955年，为来自西北地区的畜牧兽医基层干部90人举办了为期一年的轮训班。翌年，又为西藏举办两期藏族牧医训练班，其中有些学员后来成了西藏地区畜牧兽医工作的领导干部。此外，学院还帮助来自东北、内蒙、北京、湖北、广西、贵州的院校和研究单位的专业人员，结合教学、研究和服务（即畜牲疾病防治）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一贯的办学方针是理论结合实践，在学习期间，就积极参加为社会服务的活动。如1949年年底，组织师生50余人，在许绶泰教授领导下，配合省兽医防治处到河西，在广漠的草原上迎着朔风奋战54天，采用免化牛瘟疫苗扑灭了流行在永昌等4个县的牛瘟。1951年秋冬为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杨诗兴教授和赵纯塘助教应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兽医队第二队，到朝鲜北方研究战地军马饲用粗料问题，为志愿军运输马骡急用的粗料提出了解决办法。1953年5月，学校组织兽医系54届学生肖志国、王积录、张启信等30人，在教师指导下，到青海玉树、果洛等地，冒着马步芳残匪骚扰的危险，参加了这些地区扑灭牛瘟的群众运动，直至10月彻底完成任务方才返校。历届在校学生通过为社会服务的活动，使甘、宁两省牲畜疾病如牛口蹄疫、骆驼蝇疫（锥虫病）、羊疥癣、羊腐蹄病不同程度地得到了防治，不仅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这两省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也使学生自身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这些学生中，通过工作岗位上的长期实践，涌现出一批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如陕西的秦晟；甘肃的杨平、张秉彝、金巨和、王素香、刘兆弼；宁夏的赵玉琪、李维新；青海的杨雨崇、王士奇；新疆的聂士林、杨尔济、龚成润、李涵春；西藏的刘尔年、罗桑以及湖南的陈可毅；北京的张洁等。这些杰出人物都得到过中央和省、区、市的各种光荣称号，他们中有的能讲一口纯熟的藏语和哈萨克语，其中杨尔济就是举世闻名的新疆细毛羊的育成者。

身处逆境

1957年春天，我随省上领导去北京聆听了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回到兰州后，便投身到党的整风运动中。由于提了一些出自肺腑的意见和建议，竟被划为“右派分子”，撤销一切领导职务，降两级使用。

这一打击来得那么突然，几乎将我击倒。但凭着对党的坚强信念，我没有消沉下去。经过历时半年的批判、交代、劳动改造后，学校又给予我重上讲台、重进实验室的机会，允许我参加勤工俭用活动（具体工作是制作病理标本和切片），并负责动物尸体剖检和病理诊断。不久，还参加了天祝的大炼钢铁活动和先锋农场的现场教学。

1960年12月，组织上根据我的表现，摘掉了我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又一身轻松地站到了我终身热爱的教书育人的岗位上。两年后，组织上派我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回校即被任命为学校的教务长。

人们常说，信念是生活的火炬。在经历了一场政治劫难后，党组织仍然这样信任和器重我，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重新获得了力量。这一时期，我除负责教务处的工作外，还担任本科生

的病理学教学和两名病理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先后应邀对新疆疑似马脑炎和青海绵平链球菌病分别进行了病理形态学和病理发生学的研究。还同校畜牧场兽医室一起开展了猪瘟病猪中枢神经系统病理变化、新生仔猪大量死亡同接种免化猪瘟毒的关系、山羊伪结核和副结核以及睾丸精液囊肿等多项研究,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正当我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奋力拼搏的时候,1966年6月,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文化革命开始了。这阵狂潮把我再一次抛入深渊。我被群管、批斗,接受劳动改造。即使这样,我还是相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企盼着有朝一日我的“问题”会弄清,会得到公正的待遇。在6年的群管生活中,除政治学习外,不许我接触专业资料,我就学习英文版的毛选四卷,政治、业务都得到了提高。1972年5月,学校为我的历史作出了结论为“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此,我失去了回到教研组继续进行病理学教学和研究的会,我的“工作”就是整天看守学生区的几座侧所不使粪便丢失。

1973年春,学校根据我的多次要求,同意由我和另外两位老教授在校图书馆内成立了资料室,编辑出版一本内部交流的《农业科技资料》,专门介绍以国外为主的农业科技信息,和国内同行进行内部交流。从1973年创刊到1980年结束,共出版了86期。与此同时,我还为当时国内唯一公开发行的一份畜牧兽医杂志、重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畜牧兽医文摘》翻译,编写了许多综述、译文和文摘。我在这两本刊物上先后发表了80多篇文章,介绍畜牧兽医科学与技术的最新成就。同时,我还组织校内外中青年教师翻译和出版了“世界卫生组织”发行的《家畜肿瘤国际组织学分类》上下两辑。这是《人体肿瘤国际组织学分类》的姊妹篇。在我独自翻译美国科学院于1972年出版的《兽医医学的新地平线》一书时,使我大开眼界。这是美、加两国的一些专家

在对北美的兽医教育、兽医研究和兽医服务进行了历时两年的调查研究后写出的一份报告，为70、80、90年代拟订的兽医事业发展规划以及对2000年的展望，我还参阅了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兽医学校指南》等文献，使我了解到国内外的兽医教育、研究和服务方面的新脉搏。相比之下，我们的差距太大了。这个“新发现”，使我着实激动和不安。我想，如何本着“洋为中用”的方针，把兽医学这个领域里的那些有用的新概念、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运用到我国，以推动我国兽医科学的迅速发展，就成了我日思夜想的一个问题。

非常幸运的是，1977年农业部在江苏扬州召开的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畜牧兽医教育工作会议上，我被指定为重点发言人。我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向出席会议的同行们系统地介绍了我所了解的发达国家和一些进步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兽医科学的教育、研究和服务方面的过去、现状和对未来的展望。经历十年动乱正处于知识饥饿状态中的与会代表，听了我的介绍后感到极大震动，深为自己国家的落后现状而不安。1978年春天，我应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科技情报所的邀请，和一些专家一同撰写了《国内外兽医教育对比及赶超设想建议》，并选择有代表性的22个国家的高等兽医教育方面的有用的数据、组织管理、入学条件、课程设置、考试、资格、行医执照和学校简况加以介绍。这份报告当时是专门供中央领导同志决策时作参考的，后来获农业部技术改进三等奖。

在那知识饥饿的漫长岁月里，我能得到来自国外的最新书刊，大多是从在北京图书进出口公司农业与生物科学部工作的中国科技大毕业生西世良那里借阅的，事情虽小，但始终萦迴在我的记忆里。

学校西迁

这是学院阶段发生的一件大事。

1953年前后，由于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学院招生规模日益扩大，占地仅175亩的小西湖原址，显然已难于满足教学需要。于是，逐渐产生了“迁校”之议。1955年春，高教部和我省省委共同决定，把兰州西区崔家崖的大坪作为新的院址。当时的兰州市市长孙剑峰带领学院领导选地3000亩，开始边征地、边迁坟、边修路、边设计。但因上水工程费用太大，高教部不同意动用教育经费而告中断。当年6月，高教部负责人又来到兰州，与省委书记张仲良共同决定，按“文化西流”的精神，学院应到河西寻找新的院址。8月学院组织有关领导到永登、武威、张掖作实地踏勘。9月提出了选址报告，经省委和高教部商定，院址选在位于河西走廊武威城南的黄羊镇，并由省城建局局长任震英围绕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为首、农业教育和研究相结合、10万人口对现代城市服务设施的要求等几个原则提出总体规划。经国家经委批准后，学院便成立了迁校委员会。1956年4月，学院与有关部门签订了设计合同和施工协议书。接着，西北兽医学院、筹建中的甘肃农学院、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甘肃农业科学院、水利学校、畜牧学校先后在黄羊新市开工兴建。这事在当时受到了一些人的赞许，但也有人对此事产生了疑虑。

在黄羊镇建院的基建工程全面铺开不久后的1957年初，省委突然宣布黄羊镇建市计划下马的决定，只保留电厂和糖厂，原定的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和农业科学院等院校迁黄计划不变。

这个决定如晴天霹雳，使学院领导犯难了，师生也沸腾了。农业教学和科学研究同其他学科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一样，都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工作生活条件。于是，学校领导及时电告高教

部,说明黄羊镇建市计划下马,学校孤立无援,办学有困难。同时派我和廖延雄教授赶往北京,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盛院长请示,同时向高教、农业两部作情况汇报。高教部于1957年5月17日专电甘肃省委张仲良书记等领导同志,认为学院在黄羊镇的基建应立即停止,建议改在原址或附近扩建,也可另找地方。

但当时的省委和学院党委对高教部的电报秘而不宣(此电直到1978年党委办公室清理档案时才被发现而公开),因此,学校在黄羊镇的基建工程一直未停。1957年6月8日,全国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运动开始后,对学院西迁持不同看法和态度的师生,大部分受到迫害,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1957年7月上旬,高教部由于没有见到甘肃省委的答复,商同农业部委托当时出差到兰州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程绍迥副院长到黄羊镇进行现场了解。他去黄前后分别向省委负责人和学院党委请示。据他1990年12月8日的回忆说,当时他从省委领导那里得到的答复是:“对建设黄羊镇的农业教育和科研基地的肯定”。回京后,高教和农业两部领导在听取他考察黄羊镇情况汇报会上的意见是:考虑到省方的大计划正在积极进行中,学院迁黄问题早有决定才拨款进行基建的,当时我们见到的困难是学校通兰州市的交通不便,离兰州文化中心稍远些。最后决定,学院还是迁黄羊镇。

1958年9月21日,中共甘肃省委和甘肃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决定,将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和甘肃农学院合并为甘肃农业大学。直属中央领导的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从此就不再存在了。

1963年9月,我结束了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为期一年的学习回到学校,校党委任命我为教务长,协助副校长许绶泰教授处理教学研究、师资培养等工作。